

了通改。无数这样的细节 确保了《辞海》的学术质量。

新版《辞海》是当代中国学术的重要坐标。我所知仅限一隅,偏颇失误难免,敬请指正。

(作者为《辞海》中国文学分科主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努力吸收学界成果 持续提高《辞海》 中国近代史学科条目质量

熊月之

DOI:10.16134/j.cnki.cn31-1997/g2.2021.01.004

当今时代,人类知识生产、传播与创新,鲜明地呈现以下四个特性:知识更新快速性、知识总量无限性、信息发布随意性、知识真伪难辨性。

知识分科越来越细,知识更新越来越快,更新周期越来越短。人类知识分为三大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数理化天地生医农,文史哲经法社教,每一门学科下面不知分出了多少二级学科、三级学科。以历史学而言,大而言之,可分中国史、世界史,再细分,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还有城市、乡村、社会、区域,古代还可以按时段,先秦、秦汉、唐宋元明清,一直细分下去。据相关学者测算,人类知识在19世纪是每50年增加一倍,20世纪初是每10年增加一倍,70年代是每5年增加一倍,而最近10年大约每3年增加一倍。

知识总量越来越巨大,巨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人类近30年来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占有史以来科学知识总量的90%。换句话说,此前几千年中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只占现有科学知识总量的10%。

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由于信息发布多样化、随意化,只要有手机,每个人都可以持续不断地发布各种信息。于是,信息世界,鱼龙混杂,真假难辨。

知识创新越来越依赖于两个基点,即对学科前沿最新知识的准确掌握,与对学科宏大背景的全面把握。前者要求的是分析,后者要求的是综合,前者要求的是专,后者要求的是通。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完成知识创新。

面对这样的知识总量,这样细密的分工,这样快速的更新,这样混杂的局面,每个人都显得越来越渺小。但是,人类需要由准确知识汇集起来的无所不包的万宝全书,这就是百科全书与《辞海》一类以准确、宏通为特点的权威工具书。因为,知识无限,能力有限。一个能力有限的人要在无限的知识海洋中创新,创造新的知识,就必须依托无限的知识界的

综合能力。于是,“对不对,查《辞海》”,成为人们获得、验证知识的有效法门之一。

百科全书与《辞海》的共同特点,都是依托知识界的集体智慧,为社会大众提供可靠的、准确的、稳定的知识。任何知识创新,都是在知识守成与变异的矛盾中展开的,都是在知识体系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实现的。《辞海》每过 10 年就新修一遍,有所保留,有所增删,有所修订,就是这种守成与变异的综合体现。

辞书讲究知识的全面性、科学性与稳定性。以知识体系相对稳定的中国近代史来说,最近 40 多年,无论是具体史料的披露,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话语的更替,研究体系的变化,都是相当广泛而深刻的。每过 10 年就对这些变化梳理一遍,这不光为相关学者与社会大众提供了可靠的参考知识,对于从事《辞海》条目修订的学者来说,每修订一遍,都是对学界动态一次新的了解、梳理与研究,也是一次综合性学习与提高。通过条目的修订与撰写,也能折射出历史学的演变与发展。在此前《辞海》修订过程中,陈绛先生和我负责近代史方面的内容,我们深感这一工作极有价值,也很有难度,但总是勉力为之。

从收词范围看,改革开放以前出版的《辞海》,所收政治性条目、阶级斗争类条目较多,经过这三四十年的不断修订,增加了许多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中外关系史的内容,也更能反映丰富的历史内涵。

释文方面,注意吸收学术界比较可靠的、稳定性较强的成果。比如,1900 年 7 月,唐才常、容闳、严复等人两次在上海举行旨在反对慈禧太后统治的“中国国会”,有八十多人参加,影响很大。会议举行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有哪些人参加?言人人殊。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称,会议是在张园举行的,因此,后人将其简称为“张园国会”。但是,根据参加会议的孙宝瑄的日记,以及与会的日本人记述,会议是在愚园举行的,地点、人数、议程均有具体记录,这些信息显然比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更为可靠。《辞海》中,多个条目述及这一事件,第五版之前的版本,释文均为“张园”,我们在修订时,便将“张园”逐一改为“愚园”。再如,1903 年发生的“苏报案”中,章太炎与邹容被捕。章太炎出狱后曾撰文,说他与邹容被捕是吴稚晖向清政府告密“献策”所致。吴奋起反驳,要他拿出证据、证人,章无法提供。后来,章在修改《邹容传》时,便将有关文字删去。蔡元培也为吴稚晖说话,力辩其无。20 世纪 80 年代初,唐振常先生发表文章,以充分的资料、严密的逻辑,论证“苏报案”本无密可告,吴也没有告密之事。《辞海》第二版(1965 年未定稿)和第三版“吴稚晖”条采用的是章太炎的说法,称“1903 年《苏报》被封,由于他(吴稚晖)的出卖,章(太炎)和邹容被捕”。第四版(三卷本)修订时,便删除了这一说法。又如,秋瑾案中汤寿潜责任问题。《辞海》第二版和第三版“汤寿潜”条称“1907 年(汤寿潜)参与浙江官绅杀害秋瑾事件”,引起争议。第四版经论证删除了相关内容。

古人强调史书在彰善瘅恶方面的特殊功能,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在信息记录、保存手段如此丰富、史书撰写与出版如此多元而发达的今天,一般史

书的功能早已远远不能与《春秋》相比了,但是,对于在广大读者中具有很高权威性的《辞海》来说,其收词、释文的影响,依然值得编撰者高度重视。正因如此,我们每次接到修订任务,总有如履薄冰之感,须认真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提高《辞海》相关条目水准。

(作者为《辞海》中国近代史分科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做好《辞海》空间科学技术分科 编纂工作的一些探索

徐博明

1999年,由《辞海》空间科学技术分科前主编何正华先生推荐,我参加了《辞海》(第六版)和《大辞海》的编纂工作。何正华先生曾参加1979年版、1989年版及1999年版的《辞海》编纂工作,从无到有,建立并完善了《辞海》空间科学技术分科的内容。何正华先生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从自己学着干,到2007年何正华先生退出,自己领着干,我始终怀着敬畏之心。这是因为《辞海》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是神圣的知识殿堂,“对不对,查《辞海》”的观念从小耳濡目染。现在自己要承担编纂任务,是不是能胜任呢?而且我们基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参加编纂《辞海》(第六版)时,我除了担任行政工作外,还担任了风云二号气象卫星的总指挥工作;参加编纂《辞海》(第七版)时,我任高分五号卫星的工程总师,和我一起参加编纂的朱卫国同志和殷前根同志在单位也承担了繁重的情报资料工作。我们最大的优势是《辞海》的编纂工作始终得到了单位领导的支持和关心。虽然在时间安排上我们都是半业余的,但是我们清楚,在编纂质量上一定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业余痕迹,要尽量达到辞海编纂处要求的编纂水准。这不仅仅是对《辞海》工作负责,而且空间科学技术分科实际上是反映我们国家航天事业的一个窗口,要尽可能准确地展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成就,这也是我们的使命和心愿。

怎么能真正做到编纂工作坚持质量第一,“发扬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呢?首先是要学习。我们参加编纂工作的同志在《辞海》(第七版)编纂启动阶段,共同学习了《辞海编纂手册》。相对整个《辞海》,空间科学技术分科从体量上来说只是沧海一粟,但要在这有限的空间里真正地反映出我国航天的概貌,并且真正做到读者有兴趣、同行专家能认可,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